张长森的为政为文

王文章

张长森兄是我钦敬的一位朋友。

不仅是我,文化领域凡与他比较熟悉的人,都对他的睿智、幽默、热情,分析问题的深刻和工作的严谨给以很高的评价。

张长森兄让我钦敬,首先是他驾驭工作大局的能力。他从一个文学青年到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厅长,在这个位子上一干三十多年。文化工作曾是意识形态的敏感领域,“文化工作危险论”的说法曾流行了多少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起的三十多年间,文化领域曾有多少波澜沉浮;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又有多少潮起潮落?在山东这样一个文化大省的文化厅长位子上,需要怎样的心力驾驭文化的航船,穿越波峰浪谷,持续地推进文化建设?个中甘苦,大概只有身在其中者才能体会。这么多年来,山东从艺术创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在全国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不少次全国文化厅局长会上,张长森厅长发言简洁明了,但他的思考都会给人以启发。从山东多少年来持续稳健的文化发展和张长森厅长实事求是、敢言直言的真知灼见中,很多人会思考文化艺术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思路和方式来发展来管理。

岁月如歌

张长森兄让我钦敬,还有他待人的热情与直率。在他身上,比较典型地体现着山东人的真诚、热情和直率。他心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在我的印象中,张长森像很多领导干部一样,每天都陷在没完没了的工作之中,他没有打牌、唱歌之类的业余爱好,也没有体育活动,工作是他的唯一爱好。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严格,批评人有时不留情面。但他又有很细心的一面,对他工作范围内的每一位同志的个人发展,遇到的困难,包括家庭生活中的困难,他都放在心上。特别是对老艺术家的创作、教学和具体生活困难等要求,他都千方百计想办法去解决。山东的很多老艺术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无疑都是从三十多年的工作相处中积淀下来的。

张长森兄是一个敢讲真话的有原则的人,处人处事远非八面玲珑应付自如,而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三十多年,退休之时还得到大家真诚的拥戴与肯定,仅靠有工作能力是难以做到的。我想,大概很重要的是他在人生的曲折经历中磨炼的淡定使他有了定力。人之心胸,有欲则窄,无欲则宽;人之心气,有欲则馁,无欲则刚。从一个文学青年而一举成为省文化厅厅长,非己之想也,是时势之推也。既不因此而张皇,也不因此而忘形,我仍是我,脚踏实地,正派做人,不做凌云之思,亦不做趋炎附势之事。长森兄正是因着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才一路长久地走来。汉代张衡在他的《归田赋》里说:“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持达观、超脱的人生态度,荣辱也就置诸脑后了。在张长森文化厅长任上,也曾有过组织部门拟安排他到仕途更开阔的工作岗位之时,但长森兄却婉谢了。有了这份超脱和淡定,所以工作抓得起,荣辱放得下。

张长森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位单纯的文化领导管理干部。其实,他的文化修养,特别是文学素养是很高的。从我们重新读到的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创作的这些小说中,可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这些作品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文学》、《萌芽》、《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上。五六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不脱稚嫩,又有思想的概念化,但洋溢其中的生活气息、生动鲜活的乡土语言以及刚刚走上文学之路的一位青年的内在激情,在今天仍有一种感动人的力量。青年张长森生活、劳动在农村,熟悉那些朝夕相处的纯朴的农民,比如在《成山爷训牛》这篇作品中,他描写的成山爷这位农民如何训牛的细节,没有农村生活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他描写的成山爷像对待孩子一样对牛犊的爱,读来也令人深深感动。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青年的创作,很难摆脱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的局限。实际上不少成熟的作家也很难摆脱这种局限。正是这种局限造成的思想概念化,使得这些作品在今天已难具有思想的意义。但正像作者所说,这些作品,记录了“一个农村青年从热爱文学创作到走向社会的心路历程”。当然这些作品也可以让读者从一个角度去看到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个侧影,也可以让我们反思文学从本质上反映社会的永恒议题。读这些作品,我也想象,假如长森兄三十多年前不在文化行政工作岗位,而继续他的文学创作,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进程中,他开阔的思想与他洋溢的才情和很好的文学语言能力结合,一定会在不断突破思想观念的束缚中创作出具有震撼力的优秀之作。当然,人生历程往往非自己所能安排,长森兄在文化领导管理岗位的成就,也堪称是一张令人满意的人生答卷了。

愿长森兄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本文系作者为《张长森作品集》一书所写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山东明天出版社出版)

青春梦和“中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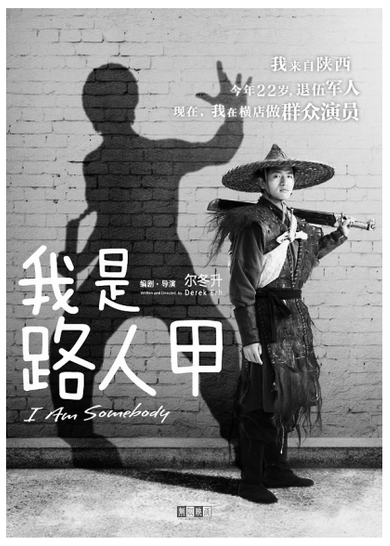
穆语彤

电影《我是路人甲》所关注的题材,并非从未有人涉及过。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顾长卫的《立春》,就处理过大致相同的内容。那些身处边缘甚或底层的追梦人,为着一个“演员梦”而艰难付出,却难于获得成功的个人遭际,无不与万国鹏们的生存境遇非常相似。而如果放宽视界,从万国鹏们的个人生存中则可以读解出自我与现实之间面临的矛盾冲突。那么,可以与《我是路人甲》归入一类的,还有《人生》、《平凡的世界》这种表达了某一时代一代人的精神困境的作品。它们在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或许是这个题材吸引向来喜欢以独特社会议题为切入点,关怀社会底层及边缘人的尔冬升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从万国鹏、王婷、覃培军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能够表征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横店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经济迅速腾飞的中国的缩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长为“东方好莱坞”,也不过十余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有无数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汇集于此,来追寻自己的“青春梦”。这些梦并不都是成为明星,他们也未必总能如愿以偿。尔冬升在这部作品中精心安排了不同类型的“横漂”的命运遭际,以此较为完整地呈现这一类人的命运。怀着“演员梦”从东北奔赴横店的万国鹏身上就有极为浓厚的《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的影子,他的不懈努力和对梦想的执着不仅为自己迎来了事业上成功的机会,也为他赢得了一份纯真的爱情。而他的女友王婷的个人遭遇,几乎是众多“励志型”作品情节的再现:目睹“横漂”的艰难处境,且自知梦想难于实现,她决意放弃梦想,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这里,她面临着两难选择,选择她爱的万国鹏,或许意味着生活将继续飘忽不定“无法看到未来”,而选择经济状况较好的耿立树,虽心有不甘,却也算得上较好的选择。这种两难处境隐约有《边城》中傩送二老在“碾坊”与“渡船”之间进行选择的意味。在影片中,由于万国鹏的坚持,二人最后有了美好的结局。但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他们的故事,因此也最能体现导演的情怀:“谁没有梦?敢于做梦,敢于去圆梦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我希望影片上演后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也希望他们能够延续这个梦继续走下去。”正因为如此,在影片的结尾,因出演微电影男主角而自视甚高却处处碰壁的魏星也开始了他新的努力;一贯懒惰的王昭也学会了为梦想而脚踏实地地奋斗……从开场到结尾,人人都在变化。被视为最为成功的“横店”模式的沈凯的“发疯”虽然以家庭的和睦温馨为主调,但不难体味出内在的残酷和凄凉。同为“横店”追梦,有人成功,有人失败,这世界不会给每一个人都准备一个美好的出路。剥离掉万国鹏们与我们身份上的差异,《我是路人甲》讲述的就不仅仅是“横漂”的遭遇。这也可能是你我的遭遇,我们很可能是万国鹏,也可能是覃培军和王昭,但我们都是路人甲。

凭海临风

在影片中,尔冬升特意安排了一场戏。大家聚集在凯哥的店里,讨论为何来横店,以及何谓“梦想”,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也都时刻准备着为梦想的实现而付出努力。十九个年轻人,他们大多是“九〇”后,他们的梦想和奋斗已经超越了这种代际的界限,他们的生存状况,很有可能是一代人生存的隐喻。如同书写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的奋斗历程的《平凡的世界》,在“六〇”后、“七〇”后甚至“八〇”后、“九〇”后那里,获得了同样积极的回应一样。而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八〇”后,怎么办?》的讨论,其实触及的不仅仅是“八〇”后的问题,“七〇”后、“九〇”后都有可能从中发现自己,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和必须去面对的精神困境。《我是路人甲》与以上问题的内在关联,充分说明它有着“中国故事”的叙事品质。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曾有过“路人甲”经历的梁朝伟的说法:“戏里,年轻的路人甲们在探讨何为成功,我看的时候也在思考。我理解的成功,不是衣食无忧,不是获奖无数,而是你能否真正享受每一次努力的过程。有梦想有目标是好事,但如果只看到目标,就很容易忽略过程,就像跑步一样,你一心想跑到终点,就会忘记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横店逐梦的万国鹏们此刻未必能体会出梁朝伟以上说法的真实意味。影片中王婷“你到底想演谁?”的追问已经体现出尔冬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当我们在追逐梦想时,很有可能忽略甚至遗忘我们自己的人生。“梦想,不仅仅是有梦、敢想,还有做梦和思考的过程。因为有了这个过程,所以,结果是什么,也没那么重要了。”梁朝伟演好每一个角色的“执念”,或许是他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对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有梦,且愿意为梦想付出努力的人的劝诫。“追梦”因此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无论是在横店,还是北京;在东北,还是西北,它都存在着。个人积极向上的力量最终汇聚为时代的潮流,这是最为真实,也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

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我是路人甲》点映现场,尔冬升详细叙述了自己从动念拍摄这部影片,到影片拍摄过程中的种种故事,之后颇为动情地说,相对于美国大片,中国电影最为缺乏的就是如“美国梦”那样的“正能量”和“主旋律”,缺乏以友爱和关怀去关注“他者”经验的叙事。如果没有一种总体性的凝聚人心的力量,个人的奋斗便飘忽不定,难于有最终的落脚处。就这一意义而言,尔冬升努力在建构一种与青春梦密切相关的“向上”精神,这当然也可以被视为是对“中国故事”的一次最好的讲述。

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化的“标本”

张 勇

中国近现代文化新旧驳杂,中西相融,在这个需要巨人也出现巨人的时代,一位位文化巨匠因时而生,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素养演绎了一段激情澎湃的文化盛宴,郭沫若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他热情如火,时而掀起一场场文化的论争;他率性而为,常常因言引发误解和争议;他博学多闻,以独到的见解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根基。总之,了解他越多,你对他的疑问可能也会越来越多。这看似悖论,但事实的确如此。但是现在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却陷入了简单“对与错”评价的漩涡之中,仅仅就他某一件事情的“对错好坏”臧否评论,但是却忽略了郭沫若在现代文化人中独有的“标本”价值。

虽然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论断是一种不自觉的误读,但其实也真实反映出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弃与选”的表述也是“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推到建设”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延续和体现。在郭沫若研究中这种“弃与选”的思维模式尤其明显,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停留在了对郭沫若作品“好与坏”的判断模式之中。说他的诗作好的,可以找出作品中优秀的诗句来证明,说他作品差的也可以以找出很多应景的创作来佐证。科学的研究绝不仅仅是简单做出价值判断,更主要的应该是在对研究对象进行评判的基础上,来寻找历史发展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以此来推动对人和事物的更全面认知,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应该起到历史发展的标本示范作用,而不仅仅只是针对单纯个体的简单评判。

史海钩沉

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从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到了“科学的春天”的历史人物,他以自己独具审美魅力的《女神》创作登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给迷雾重重的中国带来了激情澎湃的青春热情和魅力,他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蜕变的艰辛和曲折过程。他每一次人生的抉择也绝不仅仅只是自我个体的方向之辨,更多地代表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显露了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变迁和更迭。而作为参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的留日十年经历便是这标本的源头和起点,重要价值更不言而喻。

郭沫若“标本”价值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他的文化选择折射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命运。郭沫若和鲁迅等一大批现代作家选择了基本相同的人生之路。实业、翻译和创作是他们初登文化历史舞台的三极构成,这三极有效地建构了他们对世界和文化的最初认知,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忽略了任何一极的存在都很难对他们做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而这些人中郭沫若便是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具体到他来讲就是学医、翻译、创作的三位一体。医学的选择说明了他依然停留在旧式传统的思想之中,依靠实业救国,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经过了翻译实践后眼界大开,开始重新认识世界,逐渐修正自己之前的思维,而创作便是他向旧传统思想告别,迎接新思想的最好的武器和表征。但这三个方面又不是单纯的替代和延续关系,而是循环往复,在学医和弃医之间的痛苦抉择表现了他在新旧传统之间的徘徊和犹豫,在翻译和创作之间的交叠同样也表现出了他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吸收和转变。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三极逐渐隐形统一为他们新式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他的创作中总是不自觉重视人物心理阐释而忽视情节建构的样式;他不是单一的作家,有众多研究著作存世;他的译作中也有多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有关科学译作的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如果仅仅用创作理论或用翻译知识甚至现代理论常识都很难给出一个圆满的解答,但是如果把他学习自然科学的背景、翻译实践的经历以及多元创作三方面结合思考,很多疑问便会迎刃而解了。因此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他们的存在都是复杂多样的。

对于像郭沫若这样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评判,某一领域成就的得失,可能就失却了他本有的历史价值。他的存在应该是一个文化标本,以供我们剖析后,寻找出历史演进的规律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之途。

女大校那一天抹了红指甲

红 孩

阿里于我的童年是陌生的。等我在中国地图青藏高原橙黄色的板块上看到她时,我已经快二十岁。那一年,我在一本文学刊物上看到毕淑敏写的中篇小说《昆仑殇》,再后来,因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殉职,使我对阿里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真诚的敬意。

这些年,在内地人热衷于房产、保健、减肥、股市时,我的目光一点也没舍得离开西部。特别是一九九六年七月,我跟随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分作家到青藏线采访后,我的心灵告诉我,记住那里的美丽风景吧,记住那些满脸高原红的兵吧。

我接触过许多从高原下来的官兵。二〇〇二年十月,我和作家石英到济南开会。第二天,我们在去泰山的路上,开车送我们的司机在听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我去过青藏线,他插话说,他就是从青藏线复员回来的兵。我侧过身,看了看他的脸,显然已经没有了高原红。我问,你复员几年了?他回答,快五年了。或许因为我们都有高原情结,一路上我们说了很多的话,都是关于雪域高原的话题。

我告诉司机师傅,我的老师军旅作家王宗仁,就是从青藏线走出来的作家。他曾经一百余次翻越唐古拉山,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多年,大部分写的都是青藏线题材。司机师傅说,他知道王宗仁老师,不光他知道,青藏线的很多官兵都知道,他们经常说王老师如何如何,仿佛王老师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从山东回到北京后,我把司机师傅的话转告给王宗仁老师,他笑着问我,你没问问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他从高原上下来身体是否适应?我不好意思地说,聊着聊着时间就过去了,给忘了。

多年以后,我再去济南,过去接待我的朋友已经退休。我问他昔日送我们去泰山的那个司机怎样?朋友说,他已经去世了,肝癌。我没问那个司机师傅生病的原因,我知道,长期在高原生活的人,由于气候和营养问题,很多人都患有癌症。那一天,我很难过。

前年底,某个寒冷的冬夜,一个来自阿里的电话把我从梦中惊醒。看着陌生的电话,我心想这该是谁呢?不等我先说话,一个轻柔的女声传过来:你是红老师吗?我是阿里军分区的汪瑞。汪瑞?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我说,你好,我是红孩,有什么事吗?汪瑞说,我刚出版了散文集《当兵走阿里》,总政艺术局的李干事让我给您邮寄一本,说您是散文家,想让您看看,帮助指点一下。我一听书名,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二十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部队,跟很多部队作家成了要好的朋友。其中不乏女将军、女大校,至于小女兵就更多了。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没有人不相信我曾在军营生活过。记得有一年,我到总后开文学创作会,当介绍到我时,一位首长开玩笑说,红孩不是外人,他是我们总后未来的女婿。

我让汪瑞把书马上邮给我。她这时才想到时差问题,歉意地说,对不起红老师,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在北京该是深夜了,可我们这里才相当于九点钟。我说,我理解,你只要想给我打电话,几点都可以。

几天后,一本崭新的《当兵走阿里》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邮来。封面是汪瑞穿着军装、背着药箱,骑马穿行在阿里雪域高原的照片。再看内文,十几篇写高原军人生活的散文映在散着墨香的纸上,我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汪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父母都是军人,她十七岁参军,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军衔为大校,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十五年前,她曾在大军区医院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毅然报名下基层到阿里军分区的一家医疗机构,从事官兵的心理咨询工作。

我见到汪瑞是在去年春天,她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记得第一次我们相见时,她没有穿军装,而是上身着一件乳白色的羽绒服,个子高高的,齐耳短发,戴着近视眼镜,说话细声细语的,跟电话里和书里的那个女大校判若两人。我送给汪瑞一本我和铁凝共同完成的《铁凝散文精品赏析》一书,并对她玩笑道,哪天你见到铁凝主席,你让她在扉页上也签个名,这样你这本书就有故事了。

由于正逢全国两会期间,我问汪瑞这次为什么没去开会。她告诉我,这届她已经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了,不过她到代表驻地去拜访了上一届的代表朋友。我问她当代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汪瑞说,她从西部边陲到大都市开会,感觉自己是那样的孤独与陌生,她记得第一次在代表小组讨论时,当人们大谈房价物价车改时,她想到的却是高原军人的生存问题。

这就是都市与边疆的差异。汪瑞缓缓地说。

那一刻,我感到浑身一阵的颤栗。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天为这为那地奔忙,可我们真正地想到过那些高原红吗?记得有一次,在某个文人相聚的场合,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作家说,看看外边的世界,想想那些在边疆站岗的兵们,真是不值得啊!我听后再也不能容忍,愤怒地吼道:请你闭嘴!你对边疆军人究竟了解多少,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不管你多么有名气,国外多么宠你,可现在我非常地鄙视你!

一个月后,第六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开始评选。在参评的作品中,有四部是写青藏高原题材的。其中有个女作家曾经独自开车到青藏线去了十五天,回来后她写了一本书。这个女作家和我认识多年,她知道我主要负责冰心散文奖,就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关注她。如果说这次没有汪瑞的《当兵走阿里》,我肯定要力挺她的。可是,汪瑞出现了,我该怎么办?经过几次内心的纠结后,我对那个女作家说,你虽然去得很辛苦,写得也很辛苦,可是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有一个女大校,她在阿里生活了十五年,她不幸得了绒癌,她用生命完成了一本书,不论从哪个角度,我的票都要投给她。如果不投给她,我从感情上做不到。听罢我的话,女作家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理解了,如果我是评委,我也会把票投给女大校。

过了六月,汪瑞他们这期鲁院研修班就该结业了。她打电话给我,说在离开北京前我们要见一面,她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约定在鲁院路南的一家四川火锅店见面。我是提前十分钟到的,在我低头玩手机时,汪瑞悄然来到我对面,她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通身穿着白底兰花旗袍,脚上踩着高跟鞋,简直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我冲她戏谑道,你是来相亲的吗?汪瑞略带羞涩地问:你觉得我漂亮吗?我说漂亮,非常漂亮。汪瑞在我对面坐下,我觉得她这身打扮要是不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面前或许更合适,可是既然已经来了,只可顺其自然。

在和汪瑞聊天时,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全都抹了红指甲。我知道,按部队规定,女兵是不可以染发、抹红指甲的。汪瑞见我好奇,她得意地把红指甲在我面前晃,我能感觉到,她很珍惜现在的自由,无拘无束。再过一个星期,她又该回到阿里,在那里,她必须长年穿着军装,由于她的军衔和军分区司令员一样高,因此,她每到一处,人们都把她看作是首长。我对汪瑞说,既然你喜欢成为自由的女人,那你为什么不转业呢?汪瑞看了看我,坚定地说,不,我绝不离开部队,我喜欢雪域高原,我离不开那些战友!

好一个女大校!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共和国女兵的力量。转眼汪瑞离开北京已经一年多了,这期间我们经常发短信通电话,有一阵,她一直没有音讯,我真担心她出了什么意外。后来,她告诉我,她代表我军参加和某外国军队的定期会晤去了。我想,在外国军队面前,英姿飒爽的汪瑞一定会给外国军人一个惊喜。在我的心里,一直坚信汪瑞是最棒的。

心香一瓣